



文艺吹来现实的风

# 光影世界 大工入相作反归

□ 韩素志

2015年恰逢世界电影诞生12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开启了中国电影之旅。而今,电影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它的思想艺术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实力。用电影传递出正能量、诠释中国梦,所起作用值得重视。

### 呼唤现实

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同属现实主义题材的墨西哥电影《暮年困境》和捷克与斯洛伐克合拍的《孩子》成为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的最大赢家,这一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的评选结果,对国内电影创作也有着无法回避的参考意义。

对现实主义题材情有独钟的,并非只有以吕克·贝松为主席的电影评委会。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召开期间,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电影回顾展悄然在北京举行。作为开幕影片,吴天明导演的遗作《百鸟朝凤》感动无数观影者。影片最后李岷城饰演的游天鸣为已逝的焦三爷吹奏《百鸟朝凤》的场景更是催人泪下。影片动人之处,除了细腻的表现形式和演员娴熟的演技。更重要的是,其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与人民的心声。

纵观历史,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影主导性的创作观念之一。当下,中国影视行业正迎来艺术生产的高峰期,涌现出如《辛亥革命》《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钱学森》等一批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

近两年,现实题材和现实主题风格影片的市场表现逐渐摆脱此前的低迷,不断给人惊喜。《观音山》《桃姐》票房均过7000万元,《二次曝光》《白日焰火》票房超过1亿元,《归来》《亲爱的》则接近3亿元票房,打破了“文艺影片不赚钱”的悖论,在获得较高票房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主流院线中的主流制作。

不仅如此,现实主义风格的导演群体也在不断扩张。一些曾经转向风格化大片的导演开始回归现实主义风格。2014年,张艺谋用充满寓意的电影名字《归来》,向人们展示着他的重新“归来”。自香港北上的导演陈可辛也接连创作出“接地气”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此外,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演员、摄影家、美术家等跨界力量的加入,进一步丰富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类型。即将在5月上映的戏剧电影《十二公民》,其导演就是曾执导过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喜剧的忧伤》的徐昂。这些都传递出了一个信号:电影创作正在向现实主义精神复归。

### 寻找诗意

艺术与商业似乎一直是电影圈争论的话题,毕竟电影产业因广阔市场而兴旺,也需要保留中国电影的艺术标杆,加深对价值观、艺术属性的表达。

2015年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仅用94天就突破百亿元大关,以几乎“一天一亿元”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目前每年拍摄各类影片接近1000部。无论是从电影的产量、票房、影院等方面来看,都预示着中国电影活跃的生产能力。

尽管电影市场一路飘红,但其中却依然缺失于优秀的作品和成熟的产业逻辑。刚刚结束的“五一”档电影票房报收6.24亿元,创造历年新高。不过,火爆的表象下却是暗潮涌动,几部反映青春题材的国产电影争议声不断,而两部口碑尚可的文艺片《闯入者》与《念念》,又面临着排片比例少、票房成绩差等问题。《闯入者》导演王小帅更是直言,“这可能是商业电影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文化产品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是否存在矛盾?在文化学者张颐武看来,票房高低不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同样,

搞笑、诙谐的情感传达也可以是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能够抓住当下这个转型时代公众的情感变化,准确真实地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传达积极向上的情感,并为观众喜闻乐见,这便是主流价值观的展示。张颐武认为,对文艺作品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追求将为我国刚刚释放的文化消费市场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理想的电影市场需要实现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共生共存。这就意味着,既要有足够的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产品,也要有满足观众诗意要求,甚至思想深度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电影的文化平衡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总体来看,我国电影产业,还在不断地提升中,摸索与观众的匹配度和适应性,商业电影仍处于成长期。如何在精神高度上弥补缺口,创作出既有优良艺术品质又能传达时代价值观的作品,用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梦,也是中国电影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观众需要什么,不是具体到买什么票看什么电影,而是观众的内心需求到底是怎么样的。”《亲爱的》编剧张冀认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既需要心灵上的安慰,也需要快节奏和信息量的刺激,编剧应该在这些需求的洞察下,写出观众内心需要的东西。

### 讲好故事

中国电影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增强以内容为王的核心竞争力,是今后中国电影面临的首要任务。

《绣春刀》编剧陈舒表示,“接地气”并不意味着编剧在创作的原始期,就奔着票房去,不能让所有的创作都以票房和观众作为考量标准。编剧应该出于对这个故事的热爱和负责来创作的。

众所周知,繁荣的电影市场,不仅能提升中国电影的话语主导权,而且也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关键是要继续提升国产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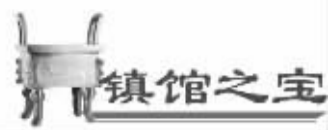
影质量,以现代电影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当前社会意识复杂多变,用电影传递出正能量,诠释中国梦,显示出快捷而明确的思想传播与普遍性的意旨,所起作用值得重视。

值得期盼的是,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随着国内影视业不断发展,以及对讲好中国故事的不断探索,我国电影市场依旧被看好。业内预计,中国电影未来有望通过资本、互联网经济和影视产业化布局等市场力量,掀起影视产业链的新变革。

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认为,我国深厚的文化积淀,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资源,若辅之以目前充沛的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切实提升“把好事讲好”的人才优势,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必成“新常态”。

电影语言怎样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面向市场、面向观众,电影创作需要打破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壁垒,在市场与观众中挖掘生命力。这显然不能简单地迎合市场,而要主动地分析市场的消费构成,准确把握市场发展走向,以具备精神价值和商业元素的优秀文化产品把握市场规律、引导市场的方向。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时,全世界看待中国电影的目光也比较复杂。当代中国电影如何追求创新实践,直面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值得思考。在复杂的眼光审视中,无论是“讲好”故事,还是讲“好故事”,中国电影都需要保持文化定力,融合互联网思维,走出一条中国电影创作之路,在融入全球电影语境的同时保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陶行知纪念馆·陶行知结婚证书

## 同心比翼

□ 江志伟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

也欢喜,欢喜你遇见了我,我也

遇见了你

在位于陶行知先生的故乡安徽省歙县老街上的陶行知纪念馆里,珍藏并陈列着陶行知先生1939年12月31日与吴树琴在重庆结婚时的结婚证书。虽然距今已经七十几度春秋,然而这件世间孤品“结婚证书”文物却依然令人感动。

之所以说它是世间孤品,一来是因为这件结婚证书上的所有文字,都是毛笔书写而成的,并不是印刷出来的;二来这件结婚证书中的文字内容是一首诗歌,并不像一般结婚证书上的文字。结婚证书上的全部文字如下:

结婚证书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你遇见了我,我也遇见了你。当时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敬相爱相扶持,偶然发脾气,也要规劝勉励。在工作中学习,在服务中努力,追求真理,抗战到底。为了大我忘小己,直等到最后胜利。再生一两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半儿像你。

文后列结婚人、主婚人、证婚人的姓名及印章,以及结婚时间和结婚地点。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诗人,南京晓庄师范创办人。吴树琴是陶行知的续弦夫人。她因崇敬陶行知的人格与创业精神而与之相爱结婚。他们彼此相爱、尊敬、支持,如同志、如战友、如师生。陶行知为民主、为革命斗争胜利了,她祝贺;受挫了,她心焦;陶行知生病了,她是特别护士;陶行知饭凉、衣破了,她是贤内助。而吴树琴所从事的制药工作,总能得到陶行知的全力支持。陶行知去世后,50年来吴树琴精心保存了丈夫的许多遗物书籍、文物、资料、墨宝,为研究陶行知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第一手素材。

陶行知与吴树琴相差24岁,是同属兔的徽州同乡。两人相爱的时间,研究者根据陶行知的诗作、书信来推断,确定为1935年7月17日。到了1939年冬天,在重庆,陶行知向吴树琴提出了结婚请求,并共同择定于1939年12月31日举行婚礼。这一天,两人简单而朴素的婚礼在火焰山清凉亭如期举行。主婚人、证婚人悉数到场,只是那张非常重要的结婚证书,却是由新郎陶行知别出心裁地自己制作的“诗歌证书”。他们的蜜月新房,就选定在重庆北碚檀香山桥附近的一个二层旧碉堡里。到底在这次婚礼上是否朗读过证书上的那首诗尚不清楚,但是,婚礼举办的次日(1940年元旦),陶氏夫妇来到重庆沈钧儒家,参加各界友人为他俩举办的庆贺茶会时,陶行知当着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等10余人的面确实是朗诵了这首诗,还引来了满堂的掌声和笑声。据吴树琴回忆,自那以后,每逢育才学校老师结婚,陶行知都要书写结婚证书上的这首诗赠贺。

与这件结婚证书有关的,还有两件现藏于南京陶行知纪念馆里的文物:一件是吴树琴署名的《结婚通告》,内容如下:“前世有缘,无法奈何,我也爱他,他也爱我。教学相长,如切如磋,好来好往,朝朝暮暮,万里长征,好事多磨,苦中有甜,彼唱此和。国难当头,理宜节约,替代钻戒,丹心一颗。不要煤公,不要煤婆,两厢情愿,终身合作。主不请客,客不恭贺,敬告亲友,大家呵呵”;另一件是陶行知创作的一首以结婚为题材的歌词:“男先生,女先生,首以结婚,打日本。怎样打日本?团结去斗争;结婚革了命,不再为自身;为民族,求生存,联合起来誓不分”,均与结婚证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 写评论 听民声

□ 丰悦

近期,文化部全面清理整顿文艺评奖,本着从严要求原则,取消一批、精简压缩一批,各类全国性文艺奖项将削减六成以上。精简奖项并不意味着艺术评价的削弱,文化部相关领导表示,今后要充分发挥包括理论评论、评奖、宣传推广、荣誉制度等在内的各种艺术评价手段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要大力加强艺术评论。

文化部此次精简文艺评奖并非无的放矢。一直以来,在我国许多领域,各种奖项设置过多过滥、评奖过程存在猫腻等问题,广遭社会诟病。这些问题,文艺工作中同样存在,它消解了文艺奖项的“含金量”,助长了文艺创作的浮躁风气,极易引发文艺腐败。此次,文化部按照中央有关精神对各类全国性文艺奖项认真梳理,对于一些没必要设置的奖项予以清理,有利于正本清源、堵塞漏洞。

文艺评奖减少了,与之对应的则是文化部在艺术评论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加

大推进力度。据悉,文化部拟通过召开媒体座谈会、创作热点研讨会、年度艺术形势分析会,在相关报刊开设艺术评论专栏、提高评论稿酬等措施,强化艺术评论效力。如此一“减”一“加”,减的是小范围、小圈子,“点”上的运作,加的是多渠道、多方式,“面”上的发力,对之,若能妥善处置,不仅不会削弱艺术评价,而且,可以扬长避短,使艺术评价更好地服务于文艺工作。

以艺术评论促进艺术评价,固然需要业内专家、学者多做工作,发挥主力军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只有注重倾听群众心声,满足群众诉求,才能吸引群众广泛参与,集群众智慧,使艺术评论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从而使之更好地“接地气”,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目前来看,艺术评论距离普通群众还有些远。一些文艺座谈会、研讨会,参会者往往清一色的业内人士;一些报刊的艺术评论栏目,更多地青睐于名家、聚焦于名

作;一些关乎艺术评论的教育培训,也常常在自我圈子内按部就班进行……艺术评论与普通群众之间,似乎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纵然“鸡犬之声相闻”,然却“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带来的后果,艺术评论无论从评价视野还是辐射范围上经常驻足于不大的“一亩三分地”,沦为自言自语、自说自听,普通群众关注较少,艺术评论的现实影响力与持久生命力难以体现出来。

文艺服务于群众,艺术评论与群众“深交”,把群众有益的意见与建议融入其中、表达出来,以此促进文艺工作的不断改进,实乃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文艺评论给人的感觉是“高大上”,可如果它不注重联系群众,不主动与群众交朋友,说到底也只能徒具光鲜外表,难有坚实根基。

要将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融入艺术评论,一方面,必须积极给群众自己站出来说话营造空间。这就需要相关机构在艺术评论活动中为群众表达心声留出一席之地,

需要文化媒体在关注名家名作的同时也莫忽视了基层群众有见地的声音,莫忽视了名家目光之外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另一方面,必须自觉为群众说出心里话给予帮助。并非所有人皆善于自主表达观点,对于他们中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业内人士要注意以适当方式深入调研,及时收集,继而形成汇聚民声的艺术评论。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以融入群众观点的艺术评论推进艺术评价,艺术评价才会改头换面,为奖项精简后的文艺发展提供持续性的有力支撑。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教蓉梁婧

邮箱 jrbzmzk@163.com